



中外翻译史解读

■ 彭桂芝 何世杰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中外翻译史解读

■ 彭桂芝 何世杰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翻译史解读/彭桂芝,何世杰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7-17394-1

I. 中… II. ①彭… ②何…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世界
IV. 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870 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5 字数:576千字 插页:1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7394-1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本书是在英语翻译硕士(MTI)《中外翻译史》教学讲义的基础之上,由武汉理工大学彭桂芝和何世杰老师在教学之余,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丰富的资料扩展、精简、改写而成。扩展是为了增加各个学派之间的关联与其相关的理论基础;精简是为了各个章节和各个理论流派之间的时间衔接;改写是区别讲义与书本之间的不同风格。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目的,《中外翻译史解读》旨在通过介绍翻译理论史和翻译实践史从而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中外翻译活动肇始的意义和作用;了解中外翻译活动的发展史和翻译流派的演变史;了解中外翻译史重要时期的主要人物及其代表性译作和翻译理论流派;同时,更好地认知翻译活动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与推动的重要性。本书编者也希望学习者在了解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联之后,能对译家与译作等做出新的反思与审视,能从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重新解读,对各流派翻译理论的演变与更替和翻译标准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与了解。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章节由彭桂芝老师撰写,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章节由何世杰老师撰写。本书依据“简明、清晰”,“轻历史、重现代”的原则进行编写,在每一个章节之前都设有学习要求、思考问题和课堂练习。除了简要介绍中外翻译史的发展过程,每一个章节还会以代表性的翻译人物和翻译理论流派为切入点,对不同研究界对翻译流派的多元理解与阐述进行呈现,既有助于学习者开阔理论视野,也能帮助学习者理清翻译流派的发展脉络与轨迹;此外还在每个代表性的翻译人物后面附有英文,介绍其著作及其相关理论观点。这样既方便学习者的研究与拓展,也呈现出本书编写方式的一大特色与亮点。既然是对翻译史的解读,当然对每一种翻译流派的来龙去脉都有历史背景的阐述,这样才能让学习者更好地认知与理解翻译流派嬗

变的原因与产生的意义。

第一章简明介绍明清以前的翻译史，其目的是让学习者了解翻译的作用与意义以及中国特殊语境下众多翻译家的翻译观。除了多元地呈现中国翻译大家对翻译史的划分之外，还分三个部分导入了明清前的翻译活动：对佛经译者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智严、宝云、智猛、法显、真谛、彦琮、玄奘、义净、不空、赞宁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明清前的科技翻译也以时间为轴线作了扼要的介绍；对明清前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也有粗略的涉猎。随后以中英两种语言，对明清前的主要翻译人物与其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主要有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等。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翻译人物与翻译理论。目的是通过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简介，让学习者了解中国特殊语境下众多翻译大家的翻译标准与翻译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士大夫们带来了世界最新的科技知识，但是由于中国对传教士限制严格，能够了解到科学成就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多，至于一般的劳苦大众更是未受影响地停留在原有的传统观念上。特别是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政府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西学翻译从此结束。直到19世纪，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西方的科技知识才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普遍影响。但是科技的传入也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的悲催命运，于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转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希望从思想上改变当时中国的士大夫，挽救危难深重的中国，因而，清朝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哲学和社会科学(哲社)类翻译被加入翻译活动中；另外还介绍了圣经翻译，以及文学作品的互译。在翻译理论与人物介绍中，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茅盾的“神韵”说和“艺术创造性翻译”论，傅雷的“神似”说与钱钟书的“化境”论。

第三章涉及的是19世纪前西方的翻译活动。本章主要简述了西方翻译史与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与分类；以及西方20世纪以前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活动，即《圣经》宗教、文学作品的翻译。其目的是让学习者了解翻译的作用与意义，从而能对西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直译与意译”、“等值”等翻译标准有进一步的认识与思考。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有斐洛的“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上帝的感召”是不能从事翻译的言说；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贺拉斯的“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词死译”的“忠实于客户翻译”法；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莫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17至19世纪，有巴特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词译(metaphrase)、释译(paraphrase)和拟译(imitation)”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

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所谓“评判译作的优劣要看专家的反映”，以及纽曼“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的观点。

第四章是翻译语言学派。本章分两个章节介绍翻译语言学派理论出现的背景与理论基础和发展态势，以及翻译语言学派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翻译标准和主要翻译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理论。在介绍翻译语言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时，主要涉及罗曼·雅各布森的等值翻译、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奈达的翻译科学的构筑、彼特·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乔治·穆南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和沃尔夫兰·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

第五章是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从功能学派概述和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入手，介绍了翻译功能学派，涉及凯瑟琳娜·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贾斯塔·霍茨-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克里斯蒂安·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和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其目的是让学习者了解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翻译行为”与“文本类型”在翻译活动中的应用前景，以及对当前我国翻译活动和翻译领域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第六章是翻译的文化转向，从两个章节对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了简要介绍。本章首先对翻译文化学派进行了概述，然后从四个发展阶段以及其历史渊源对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作了阐述。第二节从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着手，介绍詹姆斯·霍尔姆斯的翻译学分类图，伊塔玛·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吉迪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或译语文本翻译论，西奥·赫曼斯的操纵论，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哲射”与“改写”，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安德鲁·切斯特曼的文化模因论（图里的发展），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其目的是通过介绍翻译研究的转向与翻译的文化转向产生的背景与前提，让学习者了解翻译文化转向中“多元系统”、“描述性翻译”、“操控论”、“文化模因论”、“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在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前景，反思其对当前我国翻译活动和翻译实践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第七章是阐释学派翻译理论，从两个章节概述了翻译的阐释学派。首先阐明了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定义及来源、阐释学的发展阶段、阐释学派的翻译观，随后介绍了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例如：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狄尔泰的体验阐释学、海德格尔的翻译本真追寻、伽达默尔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作为对异的考验及翻译的12种变形倾向等。其目的是在介绍阐释学派翻译理论背景与发展轨迹的同时，让学习者了解“阐释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分类与哲学理论发展的关联，理清阐释学派的翻译观及其在翻译活动中哲学对翻译的指导作用与反拨。

第八章是解构主义学派翻译理论。本章概述了解构主义的内涵、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解构学派的核心翻译观及其得失以及解构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相关理论。其中主要有德里达的“异延”和“播撒”翻译、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米歇尔·福柯的文本存在着历史性、瓦尔特·本雅明的“纯语言”、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学以及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目的是让学习者了解“解构主义”、“异延翻译”、“播撒翻译”、“纯

语言”、“异化翻译”等翻译理论及其翻译活动对他国文化的影响和警示性作用，以及对当前我国翻译活动和翻译领域的应用价值与促进作用。

本书作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研项目得到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外国语学院同仁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笔下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者

2015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明清前的翻译史	/ 1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的划分	/ 2
第二节 明清前的翻译活动导入	/ 3
一、明清前的佛经翻译概述	/ 4
二、明清前的科技翻译	/ 10
三、明清前的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	/ 12
第三节 明清前的翻译人物与其理论介绍	/ 13
一、安世高与其“直译”译本	/ 14
二、支娄迦谶与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 16
三、支谦与其“会译”的体裁	/ 17
四、释道安与其“五失本”和“三不易”	/ 18
五、鸠摩罗什与其“新译”时代	/ 21
六、彦琮与其“十条”和“八备”	/ 23
七、玄奘与其“五不翻”	/ 25
八、赞宁与其“六例”	/ 27
第二章 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 30
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的导入	/ 32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翻译活动	/ 32

二、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哲社类翻译	/ 34
三、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圣经翻译	/ 36
四、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翻译	/ 40
五、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作品 的外译活动	/ 47
第二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 与相关译者介绍	/ 58
一、马建忠与其“善译”	/ 58
二、严复与其“信、达、雅”	/ 60
三、鲁迅与其“宁信而不顺”	/ 64
四、茅盾与其“神韵”说和“艺术创造性翻译”论	/ 67
五、傅雷与其“神似说”	/ 70
六、钱钟书与其“化境”	/ 74
第三章 19 世纪前西方的翻译活动	/ 78
第一节 西方翻译史和翻译流派的划分	/ 79
一、西方翻译史阶段的划分	/ 79
二、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	/ 82
第二节 19 世纪前翻译史介绍	/ 87
一、19 世纪前翻译史论概述	/ 87
二、19 世纪前翻译活动概述	/ 88
第三节 19 世纪前的翻译理论家及其理论	/ 95
一、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与其“作为解释员” 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方法	/ 95
二、贺拉斯与其“忠实于客户翻译”法	/ 97
三、昆体良与其“竞争”说	/ 99
四、哲罗姆与其“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 99
五、奥古斯丁与其“上帝的感召”说	/ 102
六、曼里乌·波伊提乌与其“逐词对译”法	/ 103
七、西德利乌·伊拉斯谟与其“尊重原作”主张	/ 104

八、马丁·路德与其采用“民众语言”的观点	/ 105
九、艾蒂安·多雷与其翻译五原则	/ 108
十、夏尔·巴特与其“作者是主人”之说	/ 110
十一、约翰·沃尔夫刚·冯·歌德与其“译者 是先知”说	/ 113
十二、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与其“直译”、 “意译”两分法	/ 115
十三、维廉·洪堡与其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 119
十四、约翰·德莱顿与其翻译三分法	/ 122
十五、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与其翻译三原则	/ 124
十六、弗朗西斯·纽曼与其“评判标准在于一般 读者而非学者”的观点	/ 126
十七、马休·阿诺德与其“评判译作的优劣要看 专家的反映”论	/ 128
 第四章 翻译语言学派	/ 132
第一节 翻译语言学派概述	/ 133
一、翻译语言学派的诞生及其特点	/ 133
二、翻译语言学派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态势	/ 134
第二节 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	/ 149
一、罗曼·雅各布森与等值翻译	/ 149
二、约翰·卡特福德与等值转换理论	/ 158
三、尤金·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	/ 164
四、彼特·纽马克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 175
五、乔治·穆南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 183
六、沃尔夫兰·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	/ 186
 第五章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 192
第一节 功能学派概述	/ 192

一、功能学派简介	/ 192
二、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研究	/ 194
第二节 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	/ 197
一、凯瑟琳娜·莱斯：文本类型理论	/ 197
二、汉斯·弗米尔：目的论	/ 208
三、贾斯塔·霍茨-曼塔里：翻译行为理论	/ 215
四、克里斯蒂安·诺德：功能加忠诚理论	/ 219
五、朱莉安·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 224
 第六章 翻译的文化转向	 / 231
第一节 翻译的文化转向简介	/ 231
一、翻译文化学派概述	/ 232
二、翻译文化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 234
三、翻译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 236
四、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 237
第二节 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	/ 238
一、詹姆斯·霍尔姆斯的翻译学分类图	/ 238
二、伊塔玛·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	/ 243
三、吉迪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或译语文本翻译论	/ 258
四、西奥·赫曼斯的操纵论	/ 265
五、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哲射”与“改写”	/ 271
六、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 279
七、安德鲁·切斯特曼的文化模因论(图里的发展)	/ 286
八、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法	/ 292
 第七章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 297
第一节 翻译的阐释学派概述	/ 297
一、阐释学的定义及来源	/ 297
二、阐释学的发展阶段	/ 298

三、阐释学派的翻译观	/ 300
第二节 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	/ 301
一、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	/ 301
二、狄尔泰的体验阐释学	/ 305
三、海德格尔的翻译本真追寻	/ 309
四、伽达默尔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	/ 315
五、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	/ 318
六、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作为对异的考验 及翻译的 12 种变形倾向	/ 327
 第八章 解构主义学派翻译理论	 / 336
第一节 解构主义概述	/ 336
一、解构主义简介	/ 336
二、解构学派翻译观及其局限性	/ 338
第二节 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介绍	/ 340
一、德里达的“异延”和“播撒”翻译	/ 340
二、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	/ 345
三、米歇尔·福柯的文本存在着历史性	/ 348
四、瓦尔特·本雅明的“纯语言”	/ 352
五、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学	/ 359
六、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	/ 365
 主要参考书目	 / 373

明清前的翻译史

要求：通过简短介绍明清以前的翻译史，让学习者了解翻译的作用与意义、对中国特殊语境下众多翻译家的翻译观有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思考题：简要概述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史，反思“五失本，三不易”对当前翻译标准的启示与影响。

课堂训练：汉译英

《三字经》(节选)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我们不能忽视语言间的相互交流所产生的作用。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人们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有的甚至还生活在势不两立的战乱之中。而对于相邻而居的人们，谁都不愿意长期生活在相互隔膜与战乱的环境里，人们期待着和平与稳定，希望能够过上互通有无的平静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口译特征的沟通与交流也应运而生。至于笔译活动，是在人类发明了文字之后，书面语性质的交流才得以出现。可以说，口译比笔译的历史更加悠久。当然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它们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各部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各部落、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发展，也保证了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安宁。由此可见，最早发生在周边各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就与翻译活动相关了，正是基于他们之间的翻译活动，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与繁荣得到了延续。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的划分

关于中国翻译史时段的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总体上有以下几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通史》中提出，中国翻译史上有四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两次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翻译。（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2-3）

王克非以文化为视角把我国的翻译文化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汉唐佛经翻译，中今代——明清科技翻译，近代西学翻译（包括由日本转译），现代全方位外籍翻译。提出四阶段说的还有张景丰，他把中国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时期，第二次翻译高潮为明清两代，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第四次翻译高潮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谢天振等著，《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3）

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部分：

古代翻译史起源于先秦至清乾隆初年《番清说》；

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

现代翻译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翻译则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4）

郭沫若从翻译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影响出发，将1949年以前的翻译划分为三个阶段：佛经翻译，《圣经》汉译，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周作人也持相似的看法：六朝至唐朝的佛经翻译；清末的圣经翻译；“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文学翻译。（陈福康，2000：14）

邹振环也持三分法的观点：他按时间序列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段。（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V）他还把16世纪末17世纪初持续至今的西学翻译作为一个单元来考察。

李亚舒、黎难秋等把佛经翻译中散见的科学知识纳入翻译外国科学资料活动，认为中国科学翻译的历史有2000多年。（谢天振等，2010：33）他们把中国科学翻译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古代（汉至明初）、中古代（明、清）、近代（清末民初）及现代（民国时期）、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23）

裴柱常和孔慧怡则主张把中国翻译史分为唐朝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他们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大型的翻译运动：第一个翻译运动是佛经翻译，关注的是性灵的知识；第二个翻译运动，始于16世纪，至今仍然持续，关注的是物质文化，翻译的最终目标是民族改革自强。虽然这两个翻译运动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文本类型各领风骚，但其中心关注的始终是国力。后一个运动中有几个冲刺期，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科学翻译就是整个西学翻译运动中最近的一个冲刺期。（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14）

王晓丹在《翻译史话》里把源远流长的中国翻译史，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

代到元代的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和印度两国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典籍;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这个时期的翻译是由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而引起的;第三阶段是中国近代对于西方科技、思想乃至文艺的全面翻译介绍,这个阶段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王晓丹,《翻译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纵观上述划分,普遍认同:1)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4)新中国成立后及以后发展的翻译等内容。只是各自表述相异或包含。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以授课内容为基础将中国翻译史分成两大部分,明清前和清代至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为主轴,以时间为线索,对不同朝代的重要翻译活动、重要翻译人物和重要翻译理论进行梳理与描述。

第二节 明清前的翻译活动导入

众所周知,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远在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就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只是苦于无文字可考。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也较少。在文字中提及翻译活动的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言语发音不尽相同、彼此交流甚少之时,也不可能通过“象寄之才”(即翻译人员)以“达其意,通其欲”(《礼记》),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10:2)但孔子依然周游了列国。其二便是公元前11世纪通过“多重翻译”而进行交流的越裳国献白雉的记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马祖毅等,2006:4)这里记载的是越裳国派使臣来向周朝的周公赠献珍禽白孔雀。古越裳国(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的林邑、扶南等地)在交趾之南,与中国相距遥远,语言不同,所以与中原只能通过“重译”,即多次翻译才能交流。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口语记录了,也是最早的“转接传译”(relay interpreting)。(谢天振等著,2010:3)而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笔译却始于战国时期,最早的翻译文字作品是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的一首包括越语原文和楚语译文的《越人歌》。楚越虽是邻国,但方言不通,交往需要借助翻译的帮助。公元前528年,楚国的鄂君子皙,乘船夜游,有越女为他驾船。越女拥楫唱了一首歌,因是越语,子皙听不懂,经过翻译才明白。刘向在记载歌词的汉语翻译之时,保留了当时人们用汉字记录的越人歌唱的原音,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成五十四字。这首《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译诗,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谢天振等著,2010:3)然而这些译员是谁,历史上并无明确记载,也尚未被历史学家发现。而关于译员的称谓,周王朝按东、西、南、北四方分别命名为“寄”、“象”、“狄鞮”和“译”,又总称“舌人”,当时主要从事口译。西汉王朝则有“译官”、“译长”之设。而“译人”、“译语人”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文雅一点,则称译人为“象胥”或“寄象”。辽朝始定口译者为“通事”,金、元、明、清时期皆因之;又定笔译者为“译史”,金、元时期因之。明朝的笔译人员,主要是四夷馆的“译字生”。清朝特设“笔帖式”,从事满、汉文字的互译和抄写;而为出使外国大臣、领事、副领事所配备的口笔译兼顾的人员则统称“翻译”和“翻译官”。纵观所载各代的翻译活动,往往略而不提口译人员,即使述及,亦不记姓名,尽管他们付出了不可或缺的大量劳动。我们在论述翻译史时,只能从有历史见

证和有历史记录的时代谈起。因而在后面章节中论述翻译领域的代表人物和其重要理论时,我们只对有重要影响的重点人物及其理论进行简述,而对只有译作而没有翻译理论的大家们仅仅做简单介绍。

一、明清前的佛经翻译概述

1. 佛经翻译活动概述

尽管诸侯各国相互交往之时出现翻译行为,不过这些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语际翻译。严格来说,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转换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在中国大量的佛教翻译是从东汉桓帝末年开始的,经魏、晋、南北朝的进一步发展,到唐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总的说来,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148年到公元316年,即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全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是基本结束时期。(马祖毅,2006:69)

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真正创始人当推汉末中土安息(即波斯)译者安世高。

安世高,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原是安息王国太子。自幼“刻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算术……无不综达”,笃信佛经,持戒精严。轮到他继承王位时,“乃深悟苦空,厌离形器”,“让国与叔,出家修道”。离开本土,游化西域各地,于桓帝建和二年(148)到达洛阳,“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慧皎《高僧传》)。从公元148年到172年(灵帝建宁五年),20余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到“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杖锡江南”(马祖毅,2006:69),到广州时为贼所杀。

据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译籍有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地道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

安世高所译经论的目的是传播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由于他通晓华语,故译文能比较准确传达出原文的意义。《高僧传》评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说他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马祖毅,2006:69)

继安世高翻译佛经的是桓帝建和元年(147)来洛阳的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在宣法”(《高僧传》)。他通晓华语,到灵帝中平年(184—189)为止,“传译梵文”,译出若干部佛经。据道安经录,有年代可考的,是3部14卷,即《般若道行经》10卷、《般舟三昧经》2卷和《首楞严经》2卷(现缺失),有疑问的计7部12卷。支娄迦谶所译属大乘佛教经典,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直译,即所谓“贵尚实中”,而以“弃文存质,深得经意”(《高僧传》)为旨意。但过分求实求质,必然致使义理隐晦,不易了解。(马祖毅等,2006:69-70)中国译界如今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与其弟子支亮,支亮之弟子支谦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佛经译者。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他受业于支亮,支亮又受业于支娄迦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的祖父在东汉灵帝时曾率月支国人数百名归化中

国，拜率善中郎将。东汉末年，洛阳一带兵荒马乱，支谦随族人南渡到东吴，孙权拜他为博士。他从小学习中国典籍，并“遍学异书，通六国语”（《高僧传》）。他译经的时间是从孙权黄武元年到孙亮建兴二年（222—253）。在这30多年中，支谦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作如《道行》、《首楞严》等加以重译，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祇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吴王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

支谦译经较多，其中道安经录就著录了30部；《出三藏记集·支谦》说有27部；《高僧传》作49部；现经考订的译本只有《大明度无极经》等29部。他的译作“曲得圣意，辞旨文雅”（《高僧传》），为安世高、支谶之后的译经大师。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合首楞严记》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疑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普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支谦还首创“会译”体裁。他曾把《无量门微蜜持经》与两种旧译对勘，区别本末，分章断句，上下排列，狠下过一番工夫。同时译文加注，也始于支谦。（马祖毅，2006：73-74）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竺法护（230—308）梵名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姓支。8岁从竺高座出家，改姓竺。据说他“诵经日万言，过目即能（记忆）”（《高僧传》）。他随师游西域诸国，学会了36种语言，搜集了大量经典佛学原本，带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终身译写，劳不告倦”（《高僧传》），而且有些佛经是在旅途中翻译的。据《出三藏记集》说，竺法护的译籍共有159部309卷，但僧祐所见写本只剩下95部206卷。以后又有散失。据近人研究，竺法护的译作仅存84部。竺法护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颇大。其译经特点有：种类繁多，范围广阔；存真偏质，提高质量；助译者多，共襄其成。（马祖毅，2006：75-69）道安在《综理众经目录》中对竺法护等译的佛经，作过这样的总评：“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竺法护和“三支”被后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释道安（314—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衡水县西南）人。出身士族，12岁出家受戒，从佛图澄受业，后被提拔为大弟子。他早期在今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传教，有弟子数百人。公元364年后，南下襄阳，住了15年，专门讲习般若。道安的后期活动，主要是从事译经，兼讲述般若诸经。他对佛教的贡献是：1）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2）确立了佛教的成规；3）主张僧以释为姓；4）整理了新旧译的经典，编出目录。大约在宁康二年（374），他着手整理和编纂经籍目录，共分为7个部分，后人称之为《综理众经目录》。此录早已佚失，但梁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已将其内容全部收入。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地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著